

上世纪初,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国内军阀混战,谁都顾不上管边界领土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卫星国。那么,最终导致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是谁呢?

谁是出卖外蒙古的罪魁祸首

雅尔塔三巨头私分外蒙

迫使国民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和苏联商议解决外蒙问题的,还是国民党自身。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两块中国领土成为苏日友好的交换条件。这一消息激怒了中国民众,蒋介石必须面对汹涌的舆论浪潮,他授意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发布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当二战临近尾声,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重要议题。斯大林提出“维持外蒙古现状”,也就是继续由苏联控制外蒙,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异议。

1945年6月9日,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当面告诉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明确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蒋介石认为,如果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可以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港口的使用权,但外蒙古问题还需再议。

1945年6月30日,一架飞机从重庆直飞莫斯科,机上的人除了宋子文、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国民政府外交事务专家,还有一个与苏联关系格外密切的人——蒋经国。

蒋经国私会斯大林

6月30日晚,中苏双方就进行了简短的初次会谈。宋子文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合作愿望。斯大林起初表现得很是客气,然而,两天后的正式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变脸了。斯大林认为中国除了承认蒙古独立外“别无选择”,偏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必须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才能给日本以致命打击。而且,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方的活动,也令蒋介石非常头疼,如果苏联支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既然台面上暂时谈不拢,他电告蒋经国,让他以个人名义去拜访斯大林。蒋经国在斯大林的官邸拜访。蒋经国说:“我们中国人坚持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打败,反而把外蒙古这样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抗战的意义何在?我们的国民,一定会骂我们卖国。”既然是私人场合,斯大林也少了很多外交辞令,很直白地告诉蒋经国:“今天不是我求你,是你来求我帮忙。如果你有力量打败日本人,我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是你没有力量,讲这些话就是废话。”蒋经国一时无语。

蒋介石三个条件“卖掉”外蒙古

蒋介石决定妥协了,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

疆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他的阴谋得逞了。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据《文史春秋》)

蒋介石为何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

苏俄在外蒙古的势力发展由来已久,但包括清末和袁世凯时期,尽管政局动荡,外蒙古独立也没有图谋成功。

对于蒋介石来说,早在1923年他作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团长到俄国考察军事为黄埔军校成立做准备时,就对苏俄将来的威胁就有多方察觉。1945年1月,美英苏背着中国签定了严重危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事后一段时间里,蒋介石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已经从各方面得知了该协定肯定有损害中国利益内容的蛛丝马迹。

抗战末期,为了避免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以便因占领而要挟,抗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曾积极与日本方面外交接洽,意图在苏联红军结束欧洲战场战事出兵东北前,促使日军投降,消除苏

联出兵东北的借口,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于是他用飞机将精兵强将运至东北,意图顺利收复东北。

8月8日,苏联一方面与日本和谈,另一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东北,蒋介石派王世杰、宋子文、蒋经国就关东军被打败后的东北地区归属等问题与苏联进行交涉,希望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面指出,如果中国不给苏联实际好处,他们没法向苏联人民交待援助中国打日本的理由。并明确指出,如果不允许外蒙古公投,苏联红军将把占领的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看来,关东军经营几十年的东北如果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将极大地增加他“剿共”的难度;另外,就东北与外蒙古两相比较,在必须丢一个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丢掉外蒙古。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国民政府代表被迫在苏联草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同意外蒙古公投。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投,投票是否同意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在苏联的组织严密的控制下,投票最后结果为:赞成独立者占全体的97%,其余为弃权,没有人投反对票。

蒋介石由此恼恨苏联。他认为,苏联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于是,在保留日本天皇制、战后索赔、战犯处理等问题上,都侧重于同日本修好,以构建东亚的反共产主义阵线。(据《老年生活报》)

200余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投诚

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空军先后有200余人驾驶145架飞机弃暗投明。

40年代:蒋介石专机机长率先起义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1946年6月初,他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6月26日,内战爆发当天,刘善本被任命为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的机长。正是这一天,他驾驶着B-24型轰炸机从昆明飞到了延安(1964年刘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刘善本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序幕。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P-51型战斗机从北平飞往四平起义投诚;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尉飞行员俞渤等5人驾驶P-51型飞机从南京飞往石家庄起义投诚……到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尉机械员岳哲安驾驶PT-17型飞机从台中飞往福州起义投诚为止,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共有110名空军飞行人员驾

驶53架飞机起义投诚。

50年代:蒋纬国旅行专机飞落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生李纯拉开了驾机投诚的序幕。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驾驶一架AT-6型教练机飞往大陆,降落福建漳浦县。

这一时期,驾机起义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国民党金马前线少校作战指挥官郝隆年。1955年1月12日,郝隆年驾驶一架C-46型战机从台中机场起义后,遇到国民党军舰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机被击伤。在福州机场上空,又误被人民解放军地面枪弹击中。郝隆年不顾枪林弹雨,果断降落在了福州机场。另一件大事是,1956年1月7日,台北飞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和事务员翟笑梧,驾驶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A-170A型飞机起义成功。此举引起台湾当局极大恐慌,蒋介石更是大为震惊。从1950年1月3日至1956年8月15日,共有22名国民党空军官兵驾机和乘机起义,成功飞回大陆。

60年代:徐廷泽获奖2500两黄金

1963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原蒋军空军第二联队十一大队四

十二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徐廷泽解释起义原因时说:“我感到台湾在美国的控制下,军人过着屈辱的生活。国民党当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美国顾问汤姆强奸了空军总部一个上尉联络官的妻子,也无人过问……”6月4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代表国防部宣布命令:授予徐廷泽少校军衔,发给奖励2500两黄金的证明书。后来,徐廷泽先后任空军某航校飞行团副团长、航校司令部副参谋长、副校长。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上尉飞行教官黄天明和飞行生朱京蓉,追随徐廷泽驾机起义。这一时期,还有4名国民党空军人员辗转回到大陆,不过,他们没有驾驶飞机。

1988年:不再奖励驾机起义者

20世纪70年代的台海上空,没有发生驾机起义的事。20世纪80年代,台湾上空重新掀起驾机起义的浪潮。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一架F-5F双座喷气式飞机,从台湾飞到大陆。黄植诚的二哥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其本人也是国

民党空军的佼佼者。而对于黄植诚的起义,大陆却首次只作了低调报道,这显然是给了主张“一个中国”的蒋经国一点面子。黄植诚后来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少将军衔。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李大维是从台湾驾机成功飞往大陆的最后一位台湾空军飞行员。之后,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于1989年2月11日,驾驶F-5战斗机飞往大陆,因未能找到汕头机场,最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伤愈后,他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

从台湾飞到大陆的台湾空军飞行员,不仅政治上得到重视,在生活上也得到很多关怀照顾。据报道,按驾机飞机的类型,黄植诚当时获得65万元奖金,李大维获得15万元奖励。

1988年9月,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

(据《党史博览》、《百姓》)